

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 走上当家作主之路

□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在西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1959年的春天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起点。61年前的这个春天，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高原吹响了迅速平息十四世达赖集团全面武装叛乱、实行民主改革的战斗号角，一场以解放农奴为核心目标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全面展开。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开辟了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

“没有作主的权利”

20世纪50年代，西藏社会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旧西藏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严重践踏了西藏人民的民主权利。

当时，占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 and 人身自由，被农奴主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赌博和交换。农奴制使广大农奴祖祖辈辈依附于领主庄园的土地上，农奴除了终身劳作外，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格尊严，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正如当时的民谚所说：“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作主的权利。”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是神权政治的典型代表，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进步。在旧西藏通行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达赖是旧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首领，上层僧侣集团掌握着西藏地方

政权的核心权力，世俗政权和宗教神权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共同构成僧俗一体的联合专制体系。在神权政治统治下，宗教上层和寺庙拥有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广大农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权利，被用于劳役和为农奴主创造价值。旧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为了巩固农奴主世袭的权益和地位，一方面，通过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置广大农奴于非人的境地，实现对广大农奴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利用佛教宿命论和轮回转世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强化宗教对社会的控制功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以及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成为广大农奴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枷锁，农奴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政治压迫、经济盘剥、精神摧残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百万农奴挣扎在极其残酷和极端贫困的人间地狱。无论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还是人权的保障角度来审视，封建农奴制是旧西藏百万农奴黑暗生活的罪恶根源，这样一种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更是对人类文明、良知和尊严的羞辱，注定要被历史抛弃。

“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历史，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人民民主，为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带来了希望。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把旧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的重大命题。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

和平解放后，西藏各族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但是，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为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为此，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1959年3月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解散了旧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民坚决平息了叛乱，有计划、有步骤地农村、牧区、寺庙、城镇以及边境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废除了农奴、奴隶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实现了翻身解放，各族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建政的过程。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旧西藏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此后，相继撤销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结束了几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到1960年底，西藏成立了1009个乡镇政权、283个区级政权，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建立了人民政权。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到1万多人，其中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

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成长为基层干部。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百万翻身农奴和奴隶穿着节日盛装，手捧哈达，兴高采烈地参加投票，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行使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基层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1965年8月，西藏乡县选举工作完成，有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567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约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农奴和奴隶为主的乡人民政权，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1965年9月，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开，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出席大会的301名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上层爱国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占11%多，藏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开创了西藏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当家作主的新纪元，这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古老的西藏“换了人间”。

西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西藏。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确定每年3月28日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西藏各族人民的伟大节日。经过严冬的人们最懂得春天的温暖。一个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已经彻底摧毁了十四世达赖集团梦寐以求恢复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存在的基础，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阻挡西藏发展进步的滚滚洪流，任何搞“西藏独立”、分裂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注定是要失败的！西藏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意志更加坚强！（摘编自2019年3月28日《西藏日报》，原标题为《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为人民服务：从提出到写入党章

□ 刘思吟

重新梳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概念的提出到形成著名篇章，再到写入党章的历史过程，既能让我们感受他的为民情怀，又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初心使命。

1939年2月，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同年12月，他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提出知识分子应该“为工农阶级服务”“为群众服务”，并以能否为群众服务作为区分不同知识分子的标准，也作为吸收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考量标准。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提出作家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并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东西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中指出，为群众利益着想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他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一是为人民服务要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他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融入共产党员的生死观，最高意义就在于无私、忘我地为人民服务。二是为人民服务要正确对待批评。三是为人民服务要搞好团结。此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题写“为人民服务”，不断

展现其蕴含的精神力量。1944年冬，他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1945年5月，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719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9月，他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1953年，《为人民服务》正式成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继续论述“为人民服务”思想，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10月4日，他在中央印刷厂礼堂向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充分准备，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作为党的宗旨。他还精辟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要做到的三个“一”，即“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了1945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以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

（摘自2019年12月2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从农奴到共和国领导人

□ 工博

1938年8月，热地出生于西藏那曲比如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出生之后就没见过父亲，从小跟随母亲，居无定所，乞讨为生。他给部落头人、牧主当过个人，在寺庙里当过“小扎巴”……

农奴命如草芥。热地记得，给头人家的孩子当“马”，嘴里塞上

绳子，抓着头发，打鞭子，让他爬，嘴巴经常被勒得鲜血淋漓。他的一个弟弟，活活饿死在母亲怀里……

“旧西藏延续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野蛮、最残酷的社会制度，比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热地说，时间已证明一切，分裂势力还想把西藏带回

到以前，怎么可能？谁会答应？

1959年，热地21岁，这是他，还有无数藏族同胞命运的拐点。这一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得以解放。热地在解放军和工作组的动员下，来到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

在那里，热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命不好，是因为剥削、压迫造成的，并不是命运的安排。

1975年，热地从那曲地委书记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在自治区领导岗位上干了近30年。

2003年3月，热地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西藏农奴，在党组织培养与自己的努力下，完成了当代传奇。

（摘自2019年第27期《工会博览》）

延安时期，县级干部的职责范畴可谓巨细靡遗，其工作生活之艰辛亦是难以想象的。县级干部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和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倘若没有崇高的精神信仰，从集于一身的工作任务实在难以很好开展。其精神信念究竟从何而来？只要关注当年中外人士在延安的观察感受，即不难发现其中的缘由。

“共产党对干部的教育十分重视”。一位国统区人士到访延安后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共产党对干部的教育十分重视。”在全部教育工作中，干部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

这位国统区人士的“发现”是精准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讲话中就曾指出：边区的县级干部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要提高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办事能力。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

1938年12月，《新中华报》发出了“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号召。边区民政厅要求在职干部必须每天抽出2小时学习。在甘泉县，规定县级干部一律要参加干部学习组织，保证每天2小时的学习时间，各单位必须统一执行。学习热潮随即开启，精神信念由此筑牢。

“到乡上去照，才能照见那里还有些灰尘，才能赶快把它洗掉，也只有到乡上去挖，才能发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马上解决它”。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延安访问之后曾说：“县长概是民选，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

革命时期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任用县长，其中内含的逻辑是县长由民众直接选举，自然应该为民众负责。换言之，在县长的思想理念中，群众就是他们的精神信仰。故而凡在一些县区内得不到群众热忱拥护与反映的，政府就要立即考虑自己工作中是否发生错误与缺点。如果群众对政府产生冷淡情绪，就要立刻想到政府的领导方面存在哪些错误与缺点，或者是政府内有不为群众所信任的人存在，或者是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或者是政府对群众没有说服精神，而采取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架子。

其时，县长的施政效果如何，最终也要在乡村“照镜子”。按照党外人士李鼎铭的说法，只有“到乡上去照，才能照见那里还有些灰尘，才能赶快把它洗掉，也只有到乡上去挖，才能发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马上解决它。这样，下情了解了，领导的正确性了解了，工作检查了，问题就解决了，并且由此取得了经验，作为领导和推动全局的根据。”这种办法在李鼎铭看来，确是“医治今天我们政府领导人员的毛病的良方”。

“农民出身的县长主要还是处理农民的事，这样比较亲切”。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到访延安后的感受是“农民出身的县长主要还是处理农民的事，这样比较亲切”。

事实正如这位记者所言，陕甘宁边区的县长几乎全是当地农民出身。因为只有本地干部大批成长并且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党才能在根据地生根。

县长由本地人担任，无论是语言习惯还是生活方式，都有着共同一致的习惯特点。同时本地干部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

对于民众而言，在选举县长时，因被选举人是本地人，谁选不选谁心里是比较清楚的。故而最终被选举的县长，自然在民众心目中有着相当的威望。也正是由于如此，民众对选举县长非常认同，只要召开选举会，民众都会敲锣打鼓庆祝游行。延长县在

延安时期中外人士对 共产党干部的观感

□ 杨东

召开选举会议时，群众不仅热烈庆祝，还特地向大会送酒食，以体现民众对选举的关切。

“‘官长’这一类的名词被人嘲笑，没有表示阶级的徽章，也没有头衔”。

一位西方记者对延安产生了这样的观感：“‘官长’这一类的名词被人嘲笑，没有表示阶级的徽章，也没有头衔。每个人，连非共产党员在内，都被叫作‘同志’。但是表示责任位置的等级，在工作上严格的保持着。”正如这位西方记者所说，革命时期干部的精神世界中，诸如“官”这样的概念，是一个极其刺眼的概念。

1938年4月初，薄一波和牺盟会干部谈话，要求派人到沁县担任抗日县长，牺盟会的党员特派员都不愿意担任此职，“他们认为县长是官，而好人不当官”。牺盟会特派员史怀璧开始也不愿意去。薄一波随即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旧社会当县长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现在共产党员当县长是革命的需要，是为党的事业去当县长。随后史怀璧才带着薄一波送给他的一匹日本大洋马、一支手枪走马上任了。

《星洲日报》的一位华侨女记者到山西五寨县政府访问吕尊周县长，去后发现县政府非但没有以往衙门中“森严可怕的气氛”，而且在县长办公室内，她发现除了办公桌、椅、两张长板凳和一个书架之外，其他摆设一无所有。这位记者同他谈话时，发现“吕县长没有官老爷的臭架子”，与其交流甚至“感觉到同自己父亲谈话一般的自然亲切”。

毫无疑问，延安时期县级干部的精神信仰，归根结底是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砥砺而成的。革命时期地方干部的精神信仰在革命的发展成长壮大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容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又何尝不是缘于这些地方干部的胜利呢！

（摘自2018年7月23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县长最终也要在乡村“照镜子”——延安时期中外人士对共产党干部的观感》）



延安时期干部在学习